

洪灾当前，不要轻言百姓“冷漠”

李思辉

洪灾的压力依然不小，需要灾区群众与领导干部、抗洪官兵一起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希望彼此多一些理解，也希望舆论场少一些杂音

过，我在咸安、赤壁、嘉鱼等地采访时看到，当地百姓在防汛抢险时并没有闲着，在大堤上巡视、堵缺口、加固子堤的，绝大多数都是当地农民。

说几件我亲历的小事吧：7月初，湖北斧头湖告急，在嘉鱼县和武汉江夏区交界的湖段，很多群众正在紧张地参与抢险工作。我在大堤上采访时遇到了一个叫金大庆的年轻人，他原本在深圳打工，但接到80多岁的母亲的电话后，星夜赶回老家参加抗洪。他对我说：“村里的男人都上了堤，我能不回来出把力吗？”

在嘉鱼县西凉湖围堤附近，我看到三畈村支书刘小毛带领十名党员群众，在水中抢险加固。40多个木桩打下去，1000多个沙包垒上去，险情基本得到控制。我问这些村民参加抢险有没有工钱，他们说，保护自家田地还要什么工钱。村支书刘小毛告诉我，每个村都领了任务，守堤的百姓都没有工钱，也没人计较。

7月7日凌晨，斧头湖咸安区泉湖村湖

堤，突然出现塌方险情，几十名泉湖村村民火速赶到现场，附近张公庙村的村民也赶来帮忙。湖水浑浊，险情不断，村民那苍松憋了一口气扎进水里，握着木桩插进湖底淤泥中，用以固定堤岸。他在水中一泡就是几个小时，直到险情基本控制住。我蹲在水边问水里的那苍松：“你顶得住吗？”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说：“水都快淹到家里来了，必须顶住！”

检索新华社关于防汛抢险的报道，也有很多百姓与抗洪官兵一起熬夜抢险、一起吃苦的故事。当洪水淹到自家门口，生命和财产安全悬于一线，这个时候谁还能无动于衷？谁还会跟抗洪官兵说“不给钱就不让砍树”？网络上的一些传闻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从逻辑还是从人性的角度来判断，恐怕都很难说得通，即使有个别极端情况，应该也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是根据一些传闻，就以偏概全地批评灾区百姓冷漠，实在不应该。

不过另一个现象倒值得注意。据我在防汛一线的观察，如今抗洪抢险队伍中的群众力量确实比过去薄弱了很多。在大堤上参与

防汛工作的，主要是50岁、60岁甚至年龄更大的村民，其中还有不少中老年妇女。比如，在斧头湖黄沙湾段，我就遇到71岁的杜楚兵老人在铲土装袋、垒筑子堤、打木桩子；在斧头湖咸安区泉湖村湖堤，村民党员余学敏带着一家6口上堤，他50多岁的妻子也扛着木桩在泥泞的大堤往返。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抗洪抢险工作时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坚强领导作用，各级干部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同等重大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经受住考验。在各地的抢险工作中，很多领导干部都枕戈待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对此，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即使有个别村民行为失当、言语不妥，领导干部也要多包容，毕竟那不是主流。

看问题要看主流，这样才能对全局有客观、理性的判断。我在防汛抗洪一线看到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也看到了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但总体来看，灾区百姓是淳朴善良的，他们在防汛抗洪工作中积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对领导干部、抗洪官兵的付出心怀感激。如今，洪灾的压力依然不小，仍需要灾区群众与领导干部、抗洪官兵一起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希望彼此多一些理解，也希望舆论场少一些杂音。



驻欧工作期间，我曾随一个中国汽车行业代表团访问德国不莱梅港，见识了有“自行车市长”之称的不莱梅市长施尔夫的风采。按照计划，我们要在著名的不莱梅市政厅广场与施尔夫市长见面并合影。当大家三三两两在广场溜达时，听到有人说“市长来了”，我们举目四顾，没发现官车，也没发现前呼后拥的“班子”。德方领队指着一位骑车前来的便衣老翁说：“这就是市长。”

施尔夫市长一边用脚踩着车，一边向我们挥手。随后，他把车停好，走过来和我们握手寒暄问好。施尔夫市长这个别开生面的出场方式，给中国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施尔夫市长带领我们参观了美轮美奂的不莱梅市政厅，介绍不莱梅市的历史和经济现状，还破例为中国贵宾打开不莱梅的“镇市之宝”——市政厅地下酒窖的老酒桶大门，让中国贵宾见识歌德曾喝过、写诗赞美过的葡萄酒。

放眼欧洲乃至许多发达国家，地方主政者为当地发展吆喝，早已屡见不鲜，很多国外官员总是想方设法充满激情地对外推介当地的经济和文化。总体来看，国外官员为地方“代言”的门道，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官员为地方代言、做广告，是理所应当之事。为官者总要想办法提振本地经济，提高本地文化的知名度，提升旅游业的吸引力，中外都一样。在欧洲，所有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提高就业率——引进投资也好，吸引更多游客也好，最终落脚点都是“增加了多少个就业岗位”。有了就业，就有了稳定的家庭、稳定的社会，也就有了稳定的税收，进而能让整个社会形成良性循环。老百姓满意了，政客们才有可能再次当选，这是最核心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的官员们总会抓住一切机会，为地方代言。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啤酒节，市长“敬开酒桶”是开幕的重头戏，历届市长从不老老实实在，往往会以各种夸张搞怪的形式“噱头”。

二是口才演讲技巧。为地方代言有不同场合与层次，或是高大上的政治会议与商务论坛，或是轻松愉快的交流，或是玩一把自嘲与幽默，许多国外官员大都能轻松应付。究其根源，这与他们从政出身与历练有关系。在欧洲各地州(省)、市、县(区)行政首脑大都是通过竞选上台，为了拉选票，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要与各阶层人士打交道，都需要锻炼口才。驻欧期间，我出席过很多次地方的商务推介活动，参加活动的州长、市长、县长们现场发言大都不用讲稿，推介外语的官员也能随英语，还会偶尔说一两句汉语活跃气氛，很少有一本正经照本宣科念讲稿的。

三是专业化运作。官员为地方代言并不是随意偶为之，常态化的前提是专业化。常规的做法是，成立专业公司或是聘请专业公关咨询公司打理。印象中，德国汉堡市做得比较专业。为了推介自己，汉堡市政府成立了一家名为Hamburg Marketing GmbH的专业公关公司，全盘负责帮市长市政府打理提升汉堡形象与商务推介活动。该公司抓住德国世界杯、北京奥运会、中国领导人出访德国和德国领导人出访中国等契机，举行各种活动提升汉堡对中国的吸引力。我曾多次受邀，参观位于汉堡的各大企业与文化名胜，包括空客总装厂、港口码头等。

四是讲规矩。官员为地方代言着眼于推动地方经济与旅游，但也要注意分寸，讲规矩。比如，为地方企业做广告不能厚此薄彼，与企业不纠缠不清，不牵涉金钱交易。众所周知，德国人有“政治洁癖”，领导人为地方或企业代言，不能牵涉一分钱的利益交换。

■新华社评

监督民警执法 镜头内外目标一致

新华社记者宋晓东

让群众举起监督的镜头，让民警“习惯在镜头下执法”，目的是规范警察执法行为，减少误会摩擦，降低执法阻力，进而提升执法效能。要认识到，手持镜头的群众和面对镜头的民警，目标是一致的。

民警执法是行使国家赋予的打击犯罪、维护公共安全的职责，说到底是在保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群众对民警执法进行监督，也是为了帮助民警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履职效能。因此，监督的同时，群众也有义务配合民警执法，“帮忙不添乱”，不干扰民警正常执法，这样警民双方才能形成合力，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反之，如果影响甚至干扰民警正常执法，损害的则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既然目标是一致的，那么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就都要瞄准目标，共同努力。对于老百姓来说，监督要依法依规，发现执法不当，可拍摄取证，向督察机关举报，督促涉事民警和所属单位改进；对于民警而言，更要认识到群众“挑刺儿”不是“挑事儿”，主动接受监督，更好、更规范地履职。

要把“镜头下执法”视作民与警之间的润滑剂，要认识到手持镜头的群众和镜头下的民警，是向着共同目标努力的统一体。而任何将之视为矛盾两端看法，都有悖于规范执法行为、共同提高执法效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宗旨。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别等媒体曝光才处理

宋潇

据澎湃新闻报道，河南开封今年的高考生王文涛多年前录入户口时，因派出所失误年龄被多录十岁，为此，他与父亲奔走六年，却因没有出生证明而一直无法改回。此事经由媒体曝光后，得到了当地公安局的重视，当即得到了妥善解决。

媒体曝光又一次“尴尬”地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一被“曝光”就“雷厉风行”，无人监管就“一拖再拖”，这种畸形的工作作风，反映出一些基层办事机构的拖沓、懒散。按理说，基层窗口单位本就是为服务大众而设，理应对以以人为本、为民办事。可在个别机关工作人员眼中，不作为、不担当反而成了工作常态。李克强总理在去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曾连讲三个故事，痛斥某些政府办事机构“在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从河南小伙王文涛的遭遇来看，基层办事机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依然存在。作为窗口单位，基层行政办事机构的工作作风和办事态度，代表了政府的形象。基层公职人员应当时刻谨记“群众利益无小事”，不断提高服务意识，摒弃高高在上的姿态，脚踏实地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国外官员为地方「吆喝」有门道

吴黎明

画里有话

“靓号费”

日前，陕西西安汉阴汤先生通过网上预选车牌号码的方式，选了一副号码为“G88C88”的车牌。当他兴高采烈地去车管所办手续时，却被告知要收8万元“靓号费”。对此，安康市车管所称，吉祥号牌按照数字不同要收取2~8万元不等费用，收费依据为2005年的一份会议纪要。

漫画：王锋

地方交警部门仅凭一个会议纪要，就给“靓号”车牌明码标价，似乎欠缺必要的行政依据。定价了之后又偷偷摸摸在最后环节收取费用，也侵害了车主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本栏编辑：邓海建



网约车新政是开门立法的典范

本报评论员叶健

28日，酝酿了两年之久的网约车新政终于出台。这部新规的出炉颇为不易，中央牵头、地方实践、多方咨询、反复研讨，其间已数易其稿。最终公布的文本，由七部门共同署名，涉及至少十一个部门的管理领域。

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但类似于网约车、电商平台等新生事物，往往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如今，随着智慧城市、宽带中国、“互联网+”、分享经济、“双创”等各类经济发展方式的出现，大量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在各行各业纷纷涌现。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但是创新创业的过程中也会带来大量社会治理难题。如何应对新生事物，不仅考验着政府的执政智慧，也影响着中国能否真正走上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的发展方向。

网约车作为分享经济的典型代表，本次新政从无到有，正是鼓励创新、依法治国的最佳注脚。对于出行需求日益增多的城市，网约车乘着移动互联网的东风，短短数年内，从新生行业爆发成长为庞然大物。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约车在方便公众出行的同时，其无序发展也带来了交通拥堵、司机人员混杂、不正当竞争等问题。同时，由于缺乏合法地位，限制了网约车平台的长远发展。因此，必要的规范不仅是公众所需，也是行业发展所需。

网约车新政的制定过程，也是开门立法的典范。从2014年初网约车平台推出大规模补贴，到2015年网约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运行，再到2016年初多方博

弈网约车新政。一部新政的出台，必然涉及多方的利益，如何兼顾改革、稳定和发展，成为政策制定者必须权衡的课题。网约车新政出台过程中，不仅相关部委反复调研，上海、义乌等地也积极探索，各个省市充分讨论，网约车平台与出租车公司更是各抒己见。最终出炉的新政，基本上成为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网约车只是诸多新生事物中的一个代表，但网约车治理的经验却具有广泛的示范意义。闭门造车不可取，立法更应打开门。监管机构需要有更敏锐的观察、更广泛的调研和更冷静的思考，新兴企业需要更充分的表达、更用心的发展和更理智的自律。网约车的实践证明，政府和市场能够处理经济边界、良性互动，既有业态和新生业态也能够协调发展、健康代谢。

彻底拔穷根，扶贫要“志智”同扶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

穷而不思进取，穷且志短，比物质的贫困更可怕。因此，扶贫要先扶志，要从思想上、精神上帮扶，帮困难群众树立摆脱困境的信心和斗志

富兰克林说过：“贫穷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以命中注定贫穷或一定老死于贫穷的思想。”在一些贫困地区，有不少贫困户似乎已经安于贫穷，他们习惯于在贫穷中熬日子，悲观地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这样了”。正因为缺少改变现状的信心和斗志，地方政府出台再好的扶贫政策、提供再好的扶贫机会，这些人也很难抓住。即使因帮扶在某一阶段经济上宽裕了一点，他们也很可能会再度返贫。

穷而不思进取、穷且志短，比物质的贫困更可怕。这也意味着，扶志比单纯财物上的扶贫工作更有难度、更具挑战性。在那些经济落后地区，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等因素制约，开展扶贫工作的难度比一般地区更大，要改变困难群众的思想观念，更是难上加难。但越是如此，地方领导干部越是不能一遇到困难挫折或短期内看不到成绩就偃旗息鼓，而应该花更多的心思、拿出更大的耐心，相信“滴水穿石”的力量。

以扶志推动扶贫工作，对地方领导干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最难得的一点是，地方干部一直没放弃带领群众脱贫的努力，也一直在通过各种举措让困难群众重树信心。从搭建务工平台、推广种植山葡萄和山核桃、用电商平台卖土特产，一条路走不通就换另一条。这种持之以恒、卯足精气神的状态，或多或少能对困难群众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增加他们改变现状的动力。

当然，空有志扶穷根的热情，并不能确保扶贫工作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从报道来看，一些贫困地区群众缺少改变现状的信心和斗志，很关键的原因是他们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技术傍身、没有可持续再生产的意识。解决好这些“非物质”问题，才能真正拔穷根，阻止贫困代际传递。也就是说，扶贫不仅要扶志，更要做好扶智工作。

摆脱贫困需要智慧、需要能力，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开展扶贫工作时把教育当作重要任务、重要突破口。事实上，习近



最近，一篇题为《一个抗洪干部的哀叹：我们水中干，百姓看翻船》的文章在网上热传，据称作者是湖北省应城市民政局一位参加了防汛工作的干部。文章称，当党员干部和抗洪官兵日夜巡堤看水、背上筑坝，忍受日晒水蒸、蚊叮虫咬的时候，一些村民却忙着去电鱼抓鱼，或是宁可坐等水淹也不肯为保卫家乡出力。

这篇文章被很多微信公号转载后都获得了10万+的阅读量，也在网上引发了热烈讨论。不知道作者写的那些村民袖手旁观的故事，是确实在防汛抗洪现场所见，还是道听途说，即使文章所讲的案例是真实的，应该也不是普遍现象。我此前在湖北防汛抢险一线待过一段时间，看到的情况并非像网上传的那样。

今年长江中下游汛情严峻，湖北很多江河湖库都已超过警戒水位，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悬于一线。在转移疏散群众、保卫百姓家园财产方面，广大党员干部和抗洪官兵确实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值得我们点赞。不



另类的“耕地效益”

王凯

五年前，我们村和周围其他三个村庄，被打包转划给了缺乏工业用地的老城区。上级部门的变更，同样没有能使大片耕地变成规划中的企业厂房。老城区接管后，早早占用十几亩耕地，很快就修好了旨在引凤筑巢的园区道路。可是一晃五年过去，新路两旁和尽头，仍然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青纱帐。由于行人车辆太过稀少，平整宽阔的柏油路反成了村民晾晒粮食和学员练车的绝佳场所。至今唯一争取到的智能机器人项目，去年横跨着本村和邻村几十亩良田破土动工，主楼刚起两层就烂尾。后来才得知，它不过是投资担保公司为了使众多投资者安心，专门盖的“实体工程”。

官方的不懈努力，始终未能使耕地发挥其应有作用。倒是不少村民“八仙过海”，用行动和成果展示了什么叫“向耕地要效益”的“民间智慧”。早在转归工业集聚区管辖之前，全村整体搬迁、耕地全部收走的谣言就传得满天飞。立刻有人活学活用其他地方的经验。几乎是一夜之间，在交通要道以及传说中即将入驻的企业可能占用的耕地上，蔬菜大棚、果苗、园林景观树木等如雨后春笋般竞相涌现。

时至今日，当初匆匆忙忙种下、眼前收获的，只有丛生的杂草和现实难题。日渐倾颓的蔬菜大棚是按最低标准胡乱建的，根本不实用；拆掉，前期投资全打水漂；不拆，耕地继续荒芜，同样是笔不大不小的损失。果树陆续挂果，是任凭其烂在地里，还是考虑真心开家采摘园？园林景观树苗早就长高长大能卖了，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市场……

至今仍在流传的拆迁征地传言，听得人耳朵都起了老茧。当初总觉得眼看就要到来，现在怎么都是遥遥无期……如果三农问题“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重要”的状态没有根本改变，华北平原这个小村庄里上演的种种耕地乱象，只会层出不穷。



谈及扶贫，很多人误以为给钱就够了，但现实并非那么简单。最近，《新华每日电讯》报道了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一个老牌贫困村的扶贫怪事：地方干部为村民寻求务工机会，村民以“吃不惯外地大米”为由拒绝；地方干部为贫困户提供鸡苗，村民把鸡苗子养大后卖掉，没买新鸡苗却把钱花个精光；地方干部为村民脱贫精打细算，贫困户却为自己生了4个儿子而骄傲，以为孩子长大了就能过好日子……(详细报道见7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

地方政府对这个贫困村的投入并不少，为何依旧陷入“年年扶贫年年贫”的困境？从前面提到的几桩扶贫怪事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有些村民不仅物质上贫困，在思想观念层面也很贫乏，缺少改变现状的志气。这个说并非奇闻怪事贫困村，而是觉得这个“老牌”扶贫村以令人无奈的现实再次证明：扶贫要先扶志，也就是要从思想上、精神上帮扶，帮困难群众树立摆脱困境的信心和斗志。